

试论霸权支点结构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胡欣¹

(1.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39)

摘要: 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关乎国家权势的问题,也是关乎国家外交战略的问题。如何在现有的霸权体系中拓展外交资源,营造有利国际环境,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霸权支点结构”是霸权实行对整个体系控制的重要凭借。通过对此结构的分析,作者认为,尽管我国永不称霸,但从支点结构出发,可以增强中国外交的广度与深度,有效减缓美国霸权的敌对态势。

关键词: 支点结构;中美关系;外交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0)06-0025-07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愈发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从历史角度看,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旧有霸权国家的阻挠,甚至有战争的危险。因此,中美关系也成为影响两国国际地位,甚至影响地区和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从当前的力量对比来看,中国处于上升阶段,但是,美国霸权的防范和压制仍然是中国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如何应对来自于现有霸权国的压力,是一项需要智慧和耐心的任务。对于中国而言,两国权势的差距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一方面,可以借助多极化力量对美国霸权进行一定制约;另一方面,还可尝试从霸权体系结构内部发掘新的途径,也就是从理解霸权体系的支点结构入手,扩展外交成效,为国家大战略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一、霸权体系的支点结构

一次次的大国兴衰告诉人们,成为一时的强国往往只要具备强大的军队就可以了,而只有建立起一个能够在多层次上确保这种强国地位的体系,才能够使我们所说的“霸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以保持延续。对于霸权体系,国际政治领域的不少学者早已作过精彩的评论和传世的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霸权诞生于近代,崛起于西方。西方文明(霸权)从欧洲大陆一直扩展至全球,一方面是因为其从 16 世纪开始,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精神文化等层面上开始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先进性不仅为其创造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西方文明依靠技术的优势、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的高效性弥补了其人数少的劣势,这也是为什

么占全球人口少数的西方国家曾经能够以少量军队统治世界的大多数地区, 并以其文化感召世界; 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西方霸权体系的建立与维系是依赖于搭建一种从本土至世界的霸权支点结构, 在适当的战略指导之下, 这种结构有效降低了霸权体系的成本, 增强了霸权控制的有效性。

所谓“霸权支点结构”, 指的是在霸权体系中, 由对霸权的运转和维系起支撑性作用的国家 and 地区所构成的、对霸权体系具有重要稳定意义的权力结构。这种支撑性力量来自于这些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特殊资源以及他们同霸权国之间的特殊关系。霸权国正是通过掌握了全球地缘政治体系的关键支点(支轴)国家或地区, 得以“以点带面”, 保持霸权体系的稳定。

为了建立和维护这样一种有利于自身权力从而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的结构, 霸权国必须从两个要素上获取支撑性力量: 其一是地理空间上的支点, 其二是权力结构上的支点。

地理上的支点意味着要占据具有全球战略性的地缘战略支点。扼守地缘战略中的关键地带一直是西方全球战略思想的精华之一, 占领了战略要冲就能够获取地缘上的优势, 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换取大得多的利益。早期的欧洲霸权葡萄牙为了获取黄金和香料, 向东方进行海外扩张。在考察了东西方贸易的流向后, 他们发现了三个咽喉要道, 对应着北印度洋的三个出口: 控制着通往欧洲航路的霍尔木兹岛和亚丁港、进入中国的门户马六甲海峡。据此, 当时的总督阿尔布克尔认为, 经营一个东方贸易帝国所需的成本是很低廉的, 只要“四个坚固的要塞和一支武器精良、拥有 3000 名欧洲裔葡萄牙人的庞大舰队”¹。其后大英帝国所营建的东方殖民帝国将这种战略几近完美地付诸于实践, “在 1914 年, 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 就统治着大约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²。而美国一贯重视争夺和控制地缘战略支点, 从马汉、斯

派克曼、布热津斯基到基辛格, 无不强调地缘政治对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性。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一方面开始向从未染指过的中亚渗透, 同时也开始改造中东地缘战略格局。这些地缘支点从空间上支撑着霸权体系结构。

霸权体系需要强有力的权力结构来支撑, 简单而言, 涉及到“我者”和“他者”两个方面。从“我者”角度看, 要求霸权国自身拥有能使之成为“霸权”的权力; 从“他者”角度看, 权力结构, 就是要通过成为体系之中的支点力量的“他者”的支持, 使霸权国能够在地区格局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 霸权国得以总揽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 最大限度地从中谋求自身国家利益。这就如同一幅“拼图”, 霸权国利用看似分割的单个部分, 组合成有声有色的宏伟大局。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对这一战略作了部分的阐述: 他把欧亚大陆比作棋盘, 提出了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概念。布热津斯基认为, 战略棋手指的是: “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他认为共有五个关键的战略棋手: 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英国、日本、印尼虽很重要, 但不具备成为棋手的资格。而相对应的还存在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 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它的力量和动机, 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对于美国而言, “认清欧亚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是其冷战后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为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 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

¹ [英] 贾斯廷·罗森伯格著, 洪邮生译: 《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36 页。

²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大棋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8 页。

政治和文化影响”¹。

由此可见,“支点力量”指的是在霸权体系重要的权力地区,能够协助霸权国对该地区实施重要影响,从而有利于其霸权地位的维持和力量行使的国家或地区。需要指出的是,支点力量并不一定要是世界强国,或是在某一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甚至不一定要是地区性大国,关键在于,它们的地位和政策取向能同霸权的意愿构成合力,在地区局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在霸权体系下的地区格局中,它们起着支撑霸权、协助霸权共同治理的作用。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支轴国家同霸权结构中的支点力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对地区大国和地区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地缘战略支轴国家在霸权体系中未必属于霸权阵营,而支点力量则是霸权制度中的重要一员,是霸权力量的构成部分,甚至可以被视作霸权国在地区的代言人。当前,全球政治的权力区主要集中于欧洲、中东、亚太和中亚。在这几个地区,美国霸权体系中支点力量主要包括: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中东地区的土耳其、以色列、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和埃及;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上升成为其支点的国家还包括波兰、捷克等部分中东欧国家、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印尼等,重建中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具备这样的可能性。

除了拉拢这些国家加入美国的霸权统治体系以外,美国还积极促成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协同,增强协调和合作。这种合作除了在老的盟国间已经存在外,还在酝酿扩展到新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华尔街日报》就曾呼吁建立一个由台湾(中国)、印度和以色列组成的、可替代邪恶轴心的亚洲民主国家联盟或亚洲民主轴心;²而美国学者马丁·沃克则认为:“美国新中东地缘战略地图,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新的三国即以色列、土耳其和印度的同盟。”³美日印三国学者就如何建立三边合作进行了深入研究;美国还对印度首先提出的“亚洲

版北约”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美国霸权体系的新扩展和新变化,那就是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变化的现实面前,从绝对优势转向在局部实现相对优势,以实现总体战略有利地位。这也是霸权支点结构的一种丰富,有助于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这一结构,它绝非单纯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更是一种具有复杂关系、能通过力量组合变化重新激发体系能量的结构。

二、霸权支点与中国外交

研究霸权的支点结构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如今中美关系呈现出稳定和积极的趋势,两国逐渐在心理上和政策上趋于保持一种务实的、不对抗的平稳状态,然而,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以及霸权国对国际社会中挑战者天生的恐惧感,使得美国始终以警惕的目光关注中国,并在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防范中国。

对于中国来讲,在新时期坚持独立自主和韬光养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面对霸权压力时,只能消极回避,被动待援。中国现在虽不具备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但是已经具备了“有所作为”的条件。特别是在多边外交舞台上,可以借助霸权支点结构的两个层面,主动为自己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首先,在从地缘角度解析了霸权的支点结构之后,可以发现,目前全球重要的地缘战略要地基本上都处于霸权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中。尽管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具备全球利益的国家,但是其中一些重要的战略地域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采取传统的强势政策争夺这些战略地区,势必将引发中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直接的对抗。这种

¹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页。

² 唐志超:“印度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第10页。

³ 同²。

争夺方式具有强烈的对抗性,不仅超出了中国现有国力的许可,而且也是同中国当前国家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的。因此,在全球地缘战略要地这一点上,中国的首要目标不是争夺控制权,而是尽可能反对霸权国家的垄断权,争取获得那些同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的地缘要冲的使用权,比如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海湾地区等。长期目标则应放在获取海上生存权上,建立一支足以确保拥有这种使用权的海上力量,既能将自己的生命线掌握在自己手中,也能建立一个海上防御区域,保证作为国家经济发展中心地区的安全。这样的政策追求完全符合中国国家大战略,同时也在当前国力许可范围之内。关键在于尽可能地维持这种途径,在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再争取使这些战略要冲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自身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大力从支点力量着手,寻求双边关系质量的稳定和提升。支点力量与霸权国关系是互动的、具有两面性的。霸权国通过控制和提供公共产品迫使支点力量在不同程度上依附霸权,而支点力量也通过在特定领域和地域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支撑着霸权的体系结构,并由此获得一定反向制约霸权的能力。因此,中国同后者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双边,还能对中美关系产生一定良性的互动,丰富中国的外交资源,激发多边外交活力,缓解美国霸权护持和中国复兴之间的矛盾。

之所以要重视中国与支点力量之间关系的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美中关系虽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两国潜在矛盾并没有发生质变,特别是关键性问题处理不当可能破坏当前相对稳定的局面。

“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步入了一个稳定阶段。应该讲,两国关系当前的发展势头是有利于双方国家整体利益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之间那种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的观点仍然有很大市场。可以预见的是,中国仍不得不面对来自于美国霸权间断的或是持续的压力。尽管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的地位凸显重要,甚至出现

G2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言论,但是,需要保持警惕的是,越是面临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美国的对外政策、军事战略就会越显得强硬,历史多次证明,“每个霸权国领导下的全系统扩张,都是在体系的危机和崩溃中达到顶峰”¹。回顾以往,尽管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中国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也不少。然而,中美关系受到台湾问题、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地区局势以及全球战略力量调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很多时候,即使中国以真诚、友好的态度来发展中美关系,仍然会招致对方的不信任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敌视。尽管坚持以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来对待中美关系仍然是必须的,然而单单将改善两国关系寄托于两国间的直接交往甚至是美国政治精英的友好回应,反而揭示了两国关系的单薄和脆弱,根本不足以保障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美国对未来中国走向的不确定,由此导致疑虑一畏惧一防范。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对双方关系中的关键性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处理不当,极易导致对抗。中国现在一方面要加大国防建设的力度,只有拥有了足够的威慑力,才能使美国在考虑对华关系上不会作出过激的行动;另一方面要在外交方面寻求新的空间,突破口就要放在支点国家身上。如上所述,支点力量是美国霸权运作中的重要环节,它既构成了美国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政治精英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考虑之一。与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在经济、国防、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完善体系的大国,美国不可能单凭一家之力对华实行“新冷战”。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问题。建立同支点国家或地区的良好关系会使中美关系中的利益交融复杂化、多元化和国际化,有利于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扩

¹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著,王宇洁译:《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6页。

展中国外交的宽度和深度。

其次,借助支点力量抑制霸权的压力是由当前世界主要矛盾和围绕此矛盾所演变的国际关系所决定的。

作为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仍然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实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稳定也是符合绝大多数国家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随着美国越来越趋向于依靠超强的国家实力来重新塑造国际格局,以谋求对国际格局的主宰和自身国家安全的保障,它同其他国家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与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应该看到,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多元化的过程。这个趋势在某些方面、某个地区或是某个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尽管从轰炸南联盟至今,美国霸权力量与其他几个极的差距(尤其是在表现最为醒目的军事领域)有扩大的势头,但是国际政治力量格局原本就应该是动态发展的,一个国家的地位不是绝对静止不变的,在这一变化中,其对外政策自然而然地会发生变化。美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对待支点力量也应该放在动态的环境下来分析。虽然它们过去或现在是霸权结构中的支点,但是,随着形势的演变,其对外政策也会出现一些重要变化。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大国,中国不论主观上愿不愿意,都无法逃避国际政治主要矛盾所带来的挑战。中国与美国在政策取向、战略构想以及国家利益上的差异,使得中国只能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促进多极化之上。多极化进程超越了历史、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等,是国际政治力量运转变换、生生不息的源泉。21世纪初的多极化在外交上给中国开启了一扇大门。美国霸权体系中的支点力量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单极同多极的斗争之中也有着自己的位置:一方面它们是美国渴望永久保留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们有着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的认识和一般国家都有的追求权力最大化和行动自由最大化的愿望。正是这种

两重属性,使得中国同英、德、法、日、韩等重要地区支点力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利益互补性。许多霸权支点力量也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越来越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对华关系。对绝大多数的支点力量而言,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能以此建立独立性更强的对外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虽然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比如奥运会、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仍会遭遇来自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但是以前那种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批评中国的情况已经很少出现了,更别说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制裁。从这一变化就可以看出,发展同支点力量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中国拓宽外交局面,同时也能够推动双方的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多极化发展所必须借助的多边合力。

最后,将发展同支点力量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作为制约霸权的手段,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上直接挑战(既包括了直接的军事挑战,也包括了在贸易、外交等方面的挑战)霸权国往往给挑战国带来更大的冲击,其预期战略目标反而少有实现。其实,这种充满对抗性的政策往往是不得已的最后的选择。在霸权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新兴强国的上升难免会遭遇旧有霸权的压制甚至是敌对。

对于中国而言,要想在发展中谋求较为平稳的大环境,必须设法在霸权支点结构上打开缺口。从围绕伊拉克的外交斗争可以看出,国家利益正在重新分化,一些支点力量不会完全满足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而是希望能够更大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有人认为,“当代国际政治继续表现为一个特征,那就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裂痕在扩大,尤其是欧洲”,而造成这种分裂的直接原因在于“华盛顿缺乏以单边手段来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尽管其军事实力占有压倒性优势”¹。这显示出美国霸权体系结构中,其单边式的帝国政策并不为其

¹ Javad Zarif “Indispensable Power Hegemonic Tendenc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2003, p. 72

他国家,包括支点力量,完全接受。这种差异性可以使得我们在同其打交道时将它们与美国区别对待。

此外,中国同一些重要的支点国家拥有共同的政治文化资源:比如说,东亚的韩国,与中国在文化上渊源较深,具备了实现更高层次合作的文化基础,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印度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面临许多相似问题,在一些问题上立场比较接近;欧洲的法国和德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趋于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支持多极化等方面中国的构想很接近。这都说明了中国与支点国家间合作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具备了编织一张能保护国家利益的复杂的外交关系网的基本条件。利用支点力量在美国霸权体系中的支撑性作用,弱化美国强权对中国的压力,令其在考虑对华政策时,不得不把支点国家的态度考虑在内,从而复杂化其决策过程,为自己争取到较长时间的良好国际环境,是一条现实的、可行的道路。

三、结语

虽然营造同支点力量的良好关系(点)有助于中国拓宽外交领域(面),但需要注意的是,要求这些国家放弃自身同美国在情感、文化、制度、利益上的密切关系,同中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无疑是不现实的。然而,争取它们在对华关系上尽可能遵循三大原则(支持中国国家建设、承认中国的主权统一、不支持美国发动新冷战)却是实实在在可行的。此外,与支点力量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目的并不在于抗衡美国的霸权或是颠覆该霸权体系。美国所构建的霸权体系从“二战”结束至今,可以说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非常全面和成熟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大多数的国家享受着以低廉成本换取的较高收益。很大程度上,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所期盼的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也必须依赖于这个体系的相对平稳。尽管这样的一个霸权体系代表了西方霸权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存在着道义和利

益上的不公正,但是,霸权体系从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权力的等级化和制度化,在世界政治发展中比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要稳定和有序得多。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人们也无法找出一个新的体系,一个在制度安排、利益分配和政治理念上都比较完善和成熟,能够得到世界主要国家认可的体系,以完全替代当前的国际体系。或者可以这样说,构建新体系的国际力量虽然已经在逐渐兴起,但尚处于量变阶段,距离真正的质变还有一段距离。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应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以霸权体系内部为舞台,以地缘战略支点和扮演支点力量的国家和地区为对象,以稳定中美关系为最大目标,推进多元外交。只有坚持在这种客观认识的大前提下,通过嵌入霸权和霸权体系支点之间的游离地带,将中美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最大化地扩展中国外交的空间。

责任编辑 薛迎春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n the Hegemonical Fulcrum Structure and Its Implication on China's Diplomacy

HU X in¹

(1.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Studies, PLA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rising of China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 of power and influence but with the problem of diplomatic strategy as well. How to develop diplomatic resources in the current hegemonical system and construct sou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se are problems of major importance requir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rising process of a stat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structure of hegemony capability-supplying is a critical reliance for a state to achieve hegemony over the whole structure. By analyzing this system, the author thinks that China as it is does not claim to lord over other states, but starting from the hegemonical fulcrum structure, we may widen and deepen China's diplomacy and effectively moderate US hostile posture.

Key words hegemonical fulcrum structure; Sino-American relation; diplomatic strategy